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王浩然¹, 王彪华², 周泽将³

(1.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2. 中国审计学会 秘书处, 北京 100086;
3. 安徽大学 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 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 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 选择 2008—2016 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 (1)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 (2) 盈余管理程度越高,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 (3) 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 (4)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 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 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关键词] 审计委员会; 海归背景; 商誉减值计提; 盈余管理; 审计质量; 审计费用; 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1)01-0058-10

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人才引进政策的日趋完善, 大批海外留学或工作人员选择回国发展, 他们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新生力量。据 2018 年《中国海归人才吸引力报告》统计数据显示, 2011 年约有 2.9 万名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验的人员回国就业, 2017 年回国就业人数已达到 5.3 万人, 年均增长率为 10.57%, 总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大批海归人员进入资本市场并就职于各类管理岗位, 现有文献已针对海归人员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1], 但关于海归人员任职于诸如审计委员会之类的专门委员会中的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对审计委员会治理有效性影响的研究则较为缺乏。审计委员会作为企业重要的内部监督机制, 自 2002 年中国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要求在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以来, 关于其能否发挥应有的监督职能仍颇受争议。海归人员一般拥有国际化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社会责任感^[2-3], 因此当其任职于审计委员会时, 可以凭借国际化的专业知识增强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 同时其较高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了审计委员会的监督动机, 进而增强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效率, 改善履职情况。已有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审计师选择存在影响^[4], 而商誉减值作为管理层操纵企业利润的手段之一, 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能否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督还有待检验,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规定企业至少在每年末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具体至商誉资产, 当并购资产的未来收益无法达到商誉账面价值时, 企业应及时计提商誉减值, 确保商誉账面价值能够准确反映商誉的公允价值, 进而提高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质量。因此, 企业是否及时准确地确认商誉减值损失一定程度上受到审计委员会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故本文预期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提高审计委员会对企业商誉减值事项的监督效率, 促使企业及时准确地进行商誉减值, 进而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程度。进一步地, 企业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来粉饰财务报告信息, 降低了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质量, 促使股东对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的监督和审查效率提出更高要求, 进而对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于商誉减值计提的促进作用产生显著影响。此外, 外部审计作为审计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的第三方鉴证, 能够有效地缓解公司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机

[收稿日期] 2020-11-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772001); 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科研活动经费资助项目(2019H218); 安徽省高校学科(专业)拔尖人才资助项目(gxhjZD02)

[作者简介] 王浩然(1992—), 男, 安徽亳州人,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财务会计理论与公司治理研究; 王彪华(1977—), 男, 四川旺苍人, 中国审计学会秘书处研究员, 从事审计理论与实践研究; 周泽将(1983—), 男, 安徽枞阳人, 安徽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财务会计理论与公司治理研究。

制^[5],即外部审计这一外部监督机制与审计委员会这一内部监督机制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由此我们可以合理预期审计质量必然会对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将盈余管理程度和审计质量作为情境变量纳入考察范畴。

具体地,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2008—2016年间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考察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可能的增量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现有研究主要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专业性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研究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有效性^[6-7],本文则以海归背景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丰富了审计委员会治理有效性方面的相关文献,同时为海归人员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增量经验证据;(2)关于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因素,现有文献多从CEO任职期限、股价高估等方面进行研究^[8-10],本文则基于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视角进行考察,为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3)本文检验了盈余管理和审计质量在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影响商誉减值计提过程中的作用,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果。

二、文献综述

审计委员会特征及其治理有效性长期以来备受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现有文献主要围绕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独立性、性别及社会关系等四方面来研究其治理有效性。在审计委员会专业性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专业性的提高不仅能够更好地监督企业财务报告的编制和相关信息的披露^[11],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内部控制存在的不足^[12]。王守海等还发现具有财务知识背景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可以凭借自身的财务专长,更加及时地发现企业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降低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13]。此外,Bepari和Mollik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财务专业背景会促使企业遵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及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和披露,从而提高财务报告质量^[14]。Al等研究发现在控制经济因素和财务报告激励因素后,审计委员会特征对强制企业采取IFRS 3后的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不存在显著影响^[15]。Adams研究发现,伴随着审计委员会成员会计专业知识水平的提高,企业及时确认商誉减值的可能性提高,与此同时财务重述发生概率降低^[16]。除专业性外,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独立性强的审计委员会不仅能强化其与外部审计师之间的互动,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提高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质量^[17],还能够促使公司的财务绩效得到改善^[18]。Kaplan研究发现企业有动机高估和低估商誉减值损失,而独立性较高的审计委员会可以约束企业这一机会主义行为^[19],如当企业出于避免违反债务契约的动机,会不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但独立性高的审计委员会可以抑制上述行为,促使企业及时计提商誉减值损失^[20]。在审计委员会性别方面,Aldamen等研究发现拥有女性成员的审计委员会能够显著提高审计质量,但女性审计委员会成员强化了企业规模以及经营风险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21];Oradi和Izadi基于财务重述视角,检验了审计委员会性别差异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发现至少有一名女性成员的审计委员会能降低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性,且更加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22]。此外,He等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成员与审计师之间的社会关系会损害审计质量,这一损害作用随着公司治理效率的下降和代理成本的提高而显著增强^[23]。

由以上文献回顾可知,学者们主要从专业性、独立性、性别以及社会关系等特征来研究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有效性,且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具有一定的影响,而海归背景作为审计委员会成员个人层面的重要特征之一,却一直被相关文献所忽略。随着海归热潮的不断兴起,大批海归人员进入资本市场并就职于各类管理岗位,且海归人员一般拥有知识水平高和社会责任感强的特征^[2-3],从而可以合理预测当海归人员任职于审计委员会时,其上述特征将有助于提高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有效性。因此,在审计委员会治理有效性的相关研究中无视海归背景这一特征无疑是不完整的。基于此,本文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有效性。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于商誉价值的评估没有严格的标准,需要涉及大量的主观判断,当企业发生商誉减值时,管理层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商誉减值计提^[24]。这就要求企业构建健全的监督机制,以此来抑制管理层操纵商誉减值的动机。审计委员会作为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肩负着审核企业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的职责。由此,企业能否避免管理层基于主观因素操纵商誉减值计提还取决于审计委员会监督职能能否有效发挥。而审计委

委员会中的海归成员凭借其海外优势能够增强审计委员会治理有效性,进而加强对商誉减值事项的审核,促使管理层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损失,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程度。

具体地,本文认为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商誉减值计提产生影响:其一,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提高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在海外求学或工作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国际化的专业知识、先进的管理技术、高远的目光以及前沿的思维观念^[25-26],从而可以利用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弥补其他成员在特定领域知识方面存在的欠缺,增强了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Bedard等研究发现高专业性的审计委员会能够更好地监督企业财务报告的编制和相关信息的披露^[11]。王守海等发现高专业性的审计委员会可以凭借自身的专长更加及时地发现企业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以降低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13]。而企业能否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是商誉账面价值能否准确反映商誉公允价值的关键,进而对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因此,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凭借其较高的专业性,能够及时发现企业确认商誉减值计提中存在的问题,促使管理层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损失,提高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程度,从而确保商誉账面价值准确反映商誉的公允价值,提高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质量。其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有利于提高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感。海外发达经济体的法律制度建设较为完善,拥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在海外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受到海外法律制度环境的影响,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3,27]。而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审计委员会在履职过程中更能够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从而更好地发挥监督和审查职能。因此,海归背景能够通过提高审计委员会的责任感来增强审计委员会对企业确认商誉减值事项的监督和审查效率,以抑制管理层源于薪酬、声誉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在企业发生商誉减值时选择不计提或者少计提商誉减值的机会主义行为,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程度得以提高。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₁。

H₁:限定其他条件,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作为重要的内部监督机制,审计委员会肩负着审核企业财务信息披露以抑制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职责。因此,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异可能对海归背景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效率产生影响。具体地,本文认为高盈余管理程度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强化海归背景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效率,进而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程度。其一,当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管理层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更加危害中小股东的权益^[28],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相较于不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而言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从而上述管理层或大股东的盈余管理行为为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成员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提供了机会。其二,伴随着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提高,管理层为了躲避外部股东的监督,倾向于发布不准确的财务信息以粉饰财务报表、维持信息不对称的局面^[29]。面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将面临更多来自股东的问责压力。综合上述分析,企业高盈余管理程度在为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履行其社会责任提供更多机会的同时,也增加了具有海归背景审计委员会的监管压力,从而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审核企业商誉减值事项的相关信息,督促管理层更加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损失,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程度。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₂。

H₂:限定其他条件,与低盈余管理程度的企业相比,高盈余管理程度的企业中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影响显著更强。

现有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是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能够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5]。而当企业融资需求增加或经理人追求高股权激励时,管理层倾向于采取不计提或少计提商誉减值的机会主义行为^[24]。因此,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从客观上降低管理层通过不计提或少计提商誉减值的机会主义行为,促使管理层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损失,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程度。因此,相对于低质量外部审计,高质量外部审计提高了商誉减值计提程度,从而减弱了海归审计委员会成员发挥其较高的专业性和社会责任感以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优势。也即,相对于低审计质量企业,高审计质量企业中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促进作用较弱。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₃。

H₃:限定其他条件,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促进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资本市场2008—2016年间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遵循惯例依次剔除下

列样本:(1)处于ST、*ST等异常交易状态的样本;(2)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样本;(3)资不抵债的样本;(4)金融保险行业的样本;(5)数据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7163个观测值。为消除极端值对数据分析结果稳定性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本文所涉及的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数据系手工从国泰安数据库董监高个人特征和任职情况的数据整理收集,市场化进程指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30],产权性质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GDP增长率数据取自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检验研究H₁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本文参照胡凡和李科的研究^[10],构建如下模型(1):

$$GWIR_{i,t} = \alpha_0 + \alpha_1 RAC_{i,t} + \alpha_2 FIRST_{i,t} + \alpha_3 INDP_{i,t} + \alpha_4 BOARD_{i,t} + \alpha_5 SOE_{i,t} + \alpha_6 AGE_{i,t} + \alpha_7 INST_{i,t} + \alpha_8 AC_{i,t} + \alpha_9 SIZE_{i,t} + \alpha_{10} LEV_{i,t} + \alpha_{11} ROA_{i,t} + \alpha_{12} BTM_{i,t} + \alpha_{13} GDP_{i,t} + \alpha_{14} MAR_{i,t} + YEAR + INDUS + \varepsilon \quad (1)$$

依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预期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RAC的系数 α_1 显著为正,说明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显著促进了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模型(1)中各研究变量的详细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GWIR表示商誉减值计提程度,借鉴卢煜和曲晓辉的方法^[31],本文采用商誉期末减值金额除以年末总资产加以测度。

(2)解释变量。RAC表示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本文采用三种方式进行度量:①RAC1等于拥有海外工作背景的审计委员会成员人数除以审计委员会总人数;②RAC2等于拥有海外学习背景的审计委员会成员人数除以审计委员会总人数;③RAC3等于拥有海外工作或学习背景的审计委员会成员人数除以审计委员会总人数。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以下变量并加以控制:①公司治理变量,由于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性质差异都会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产生影响^[32-33],因此本文控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等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除以总股数)、独立董事比例INDP(等于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董事会规模BOARD(等于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产权性质SOE(若最终控制人为国有则赋值为1,否则0)、上市年限AGE(观测年份与上市年份之差加1的自然对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等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数与总股数的比值)。②公司特征变量,本文参考Glaum等和田新民等、陆亚晨等的研究^[34-35],控制企业个体特征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将代理成本AC(等于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企业规模SIZE(等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财务杠杆LEV(等于年末总负债与年末总资产之比值)、盈利能力ROA(等于净利润与年末总资产的比值)、账面市值比BTM(等于股东权益合计与总市值的比值)等可能影响商誉减值的公司个体特征类变量放入回归模型。③当国民经济发展向好、销售需求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提高时,企业面临较低的商誉减值风险,因此,参考张东旭和曹瑾的研究^[36],本文控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DP(等于各省市自治区实际GDP年度增长率)。④良好的制度环境会提高会计准则的执行效果^[37],制度环境亦会对商誉减值这一会计准则执行事项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控制市场化进程MAR,以王小鲁等提供的各省份市场化指数加以度量^[30]。⑤年份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INDUS。

为验证H₂盈余管理程度的调节作用,在模型(1)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引入盈余管理程度及其与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之交乘项,构建如下模型(2):

$$GWIR_{i,t} = \alpha_0 + \alpha_1 RAC_{i,t} + \beta_1 RAC_{i,t} \times DA_{i,t} + \beta_2 DA_{i,t} + \alpha_2 FIRST_{i,t} + \alpha_3 INDP_{i,t} + \alpha_4 BOARD_{i,t} + \alpha_5 SOE_{i,t} + \alpha_6 AGE_{i,t} + \alpha_7 INST_{i,t} + \alpha_8 AC_{i,t} + \alpha_9 SIZE_{i,t} + \alpha_{10} LEV_{i,t} + \alpha_{11} ROA_{i,t} + \alpha_{12} BTM_{i,t} + \alpha_{13} GDP_{i,t} + \alpha_{14} MAR_{i,t} + YEAR + INDUS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模型(2)中DA表示盈余管理程度,本文参考Dechow等的研究^[38],采用分行业分年度的修正Jones模型计算获得的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绝对值加以测度。

为验证H₃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在模型(1)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引入审计质量及其与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之交乘项,构建如下模型(3):

$$GWIR_{i,t} = \alpha_0 + \alpha_1 RAC_{i,t} + \beta_1 RAC_{i,t} \times BIG4_{i,t} + \beta_2 BIG4_{i,t} + \alpha_2 FIRST_{i,t} + \alpha_3 INDP_{i,t} + \alpha_4 BOARD_{i,t} + \alpha_5 SOE_{i,t} + \alpha_6 AGE_{i,t} + \alpha_7 INST_{i,t} + \alpha_8 AC_{i,t} + \alpha_9 SIZE_{i,t} + \alpha_{10} LEV_{i,t} + \alpha_{11} ROA_{i,t} + \alpha_{12} BTM_{i,t} + \alpha_{13} GDP_{i,t} + \alpha_{14} MAR_{i,t} + YEAR + INDUS + \varepsilon \quad (3)$$

模型(3)中BIG4表示审计质量,若企业审计师为国际“四大”,BIG4赋值为1,否则为0。

五、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GWIR* 的平均值为 0.0015, 标准差为 0.0053, 标准差高于平均值的 3 倍, 说明各上市公司之间商誉减值计提程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RAC1* 和 *RAC2* 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均分别等于 0.0000 和 0.6667, 表明不同企业中拥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数量存在较大的差异。*RAC3* 的均值为 0.1079, 即企业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人数占审计委员会总数的比例只有 10.79%, 揭示出目前企业审计委员会中所拥有的海归成员人数较少。

(二) 多元回归分析

1.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表 2 列示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第 (1) 列中 *RAC1* 与 *GWIR* 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 (2) 列中 *RAC2* 与 *GWIR* 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 (3) 列中 *RAC3* 与 *GWIR* 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 以上结果联合表明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显著促进了商誉减值计提程度提高, 支持 H_1 。进一步的分析可知, *RAC1* 项回归系数无论在数量层面还是显著性层面均和 *RAC2* 项系数基本保持一致, 表明无论是审计委员会的海外留学经历还是海外任职经历, 它们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影响程度基本一致, 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任职于审计委员会的海归人员在海外求学或工作过程中获得了国际化的专业知识和先进的管理理念, 提高了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 并且由于长期受到海外发达经济体的法律制度环境的熏陶, 拥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 从而使得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在履职过程中凭借较高的专业性和社会责任感, 积极对企业商誉减值事项的相关信息更加有效地审查, 降低管理层为追求私利而少计或者不计提高誉减值的动机, 促使管理层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程度。

控制变量方面: ① *FIRST* 和 *SOE* 项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或处于国有企业中时, 商誉减值计提程度会有所降低。*AGE* 项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上市年限越长, 商誉减值计提程度越高。② *SIZE*、*ROA*、*BTM* 项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和账面市值比越高, 商誉减值计提程度越低。*AC* 项系数显著为正, 揭示出企业代理成本越高, 商誉减值计提程度越高。③ *GDP* 项系数显著为负, 揭示出当企业所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时, 商誉减值计提程度越低。

表 1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N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 分位	中位数	75% 分位	最大值
<i>GWIR</i>	7163	0.0015	0.0053	0.0000	0.0000	0.0000	0.0003	0.0388
<i>RAC1</i>	7163	0.0504	0.129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6667
<i>RAC2</i>	7163	0.0801	0.156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6667
<i>RAC3</i>	7163	0.1079	0.1815	0.0000	0.0000	0.0000	0.2500	0.6667
<i>DA</i>	7163	0.0629	0.0656	0.0008	0.0199	0.0434	0.0827	0.3756
<i>BIG4</i>	7163	0.0310	0.173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i>FIRST</i>	7163	0.3361	0.1484	0.0793	0.2213	0.3126	0.4379	0.7430
<i>INDP</i>	7163	0.3713	0.0522	0.3333	0.3333	0.3333	0.4000	0.5714
<i>BOARD</i>	7163	0.7625	0.0932	0.4759	0.7321	0.7872	0.7872	0.9962
<i>SOE</i>	7163	0.3701	0.4829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1.0000
<i>AGE</i>	7163	2.1877	0.6458	0.6931	1.6094	2.3026	2.7726	3.1781
<i>INST</i>	7163	0.3972	0.2263	0.0067	0.2075	0.4032	0.5742	0.8596
<i>AC</i>	7163	0.1818	0.1374	0.0175	0.0911	0.1448	0.2285	0.7471
<i>SIZE</i>	7163	22.1735	1.1206	20.0400	21.3615	22.0514	22.8543	25.4018
<i>LEV</i>	7163	0.4463	0.2032	0.0610	0.2864	0.4447	0.6041	0.8732
<i>ROA</i>	7163	0.0412	0.0471	-0.1281	0.0150	0.0363	0.0648	0.1845
<i>BTM</i>	7163	0.8766	0.8764	0.0965	0.3418	0.5790	1.0527	4.9978
<i>GDP</i>	7163	0.0910	0.0211	0.0450	0.0773	0.0849	0.1010	0.1530
<i>MAR</i>	7163	7.8319	1.7938	-0.2300	6.5800	8.1000	9.3000	10.0000

表 2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变量	(1) <i>RAC1</i>		(2) <i>RAC2</i>		(3) <i>RAC3</i>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i>C</i>	0.0123 ***	5.7167	0.0124 ***	5.7528	0.0124 ***	5.7467
<i>RAC</i>	0.0011 **	2.0746	0.0011 **	2.3741	0.0009 **	2.5305
<i>FIRST</i>	-0.0009 **	-2.3819	-0.0009 **	-2.3716	-0.0009 **	-2.4092
<i>INDP</i>	0.0012	0.8803	0.0011	0.8507	0.0012	0.8863
<i>BOARD</i>	-0.0008	-0.9581	-0.0008	-0.9930	-0.0008	-0.9971
<i>SOE</i>	-0.0003 *	-1.8043	-0.0003 *	-1.8136	-0.0003 *	-1.8006
<i>AGE</i>	0.0006 ***	5.3156	0.0006 ***	5.4610	0.0006 ***	5.4572
<i>INST</i>	0.0001	0.3623	0.0001	0.3351	0.0001	0.3291
<i>AC</i>	0.0035 ***	4.8866	0.0035 ***	4.8591	0.0035 ***	4.8491
<i>SIZE</i>	-0.0005 ***	-5.3865	-0.0005 ***	-5.4371	-0.0005 ***	-5.4377
<i>LEV</i>	-0.0003	-0.6376	-0.0003	-0.6118	-0.0003	-0.6367
<i>ROA</i>	-0.0183 ***	-6.7912	-0.0183 ***	-6.7879	-0.0183 ***	-6.7998
<i>BTM</i>	-0.0003 ***	-3.6004	-0.0003 ***	-3.6210	-0.0003 ***	-3.5724
<i>GDP</i>	-0.0119 ***	-2.5956	-0.0117 **	-2.5502	-0.0117 **	-2.5535
<i>MAR</i>	0.0001	1.4908	0.0001	1.5007	0.0001	1.4653
<i>YEAR/INDUS</i>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7163		7163		7163	
Adj_R ²	0.0823		0.0826		0.0826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双尾), 所有 t 值均经过 Robust 调整。

2.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盈余管理程度的调节作用

表3列示了企业不同盈余管理程度下,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的多元回归结果。第(1)列至第(3)列中 $RAC1 \times DA$ 、 $RAC2 \times DA$ 、 $RAC3 \times DA$ 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以上经验证据联合揭示企业盈余管理程度的提高强化了海归背景审计委员会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验证了 H_2 。上述结果表明,企业较高的盈余管理程度说明企业管理层可能会为了个人私利而采取有损股东权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相较于不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而言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上述有损股东权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为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履行其社会责任提供了机会,进而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将更加主动地对企业商誉减值事项进行审查,促使管理层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损失,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维护股东权益。同时较高的盈余管理程度意味着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较低,使得股东提高对海归审计委员会成员监督效率的要求,为缓解来自股东的压力,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将积极审查企业商誉减值事项,以促使企业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损失,提高财务信息质量。因此,在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中,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高盈余管理程度可能更加危害中小股东的权益,海归审计委员会相较于非海归审计委员会而言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上述危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为海归审计委员会履行其社会责任提供了机会,同时较高的盈余管理程度使得股东提高对海归审计委员会监督效率的要求,进而促使海归背景审计委员会更加主动地对企业商誉减值事项进行审查,促使管理层及时充分地确认商誉减值损失,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程度。

3.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表4列示了企业不同审计质量下,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的多元回归结果。第(1)列至第(3)列中 $RAC1 \times BIG4$ 、 $RAC2 \times BIG4$ 、 $RAC3 \times BIG4$ 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以上经验证据联合揭示企业审计质量的提高弱化了海归审计委员会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验证了 H_3 。上述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雇佣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时,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程度将会增加,这将减弱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发挥其在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程度方面的海外优势,进而,在高审计质量的企业中,海归审计委员会与商誉减值计提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减弱,亦在情理之中。

(三) 敏感性分析

为了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采用了以下敏感性测试方法。

1. Heckman 两阶段回归

聘任海归人员进入审计委员会可能是出于企业治理的现实需要,而非服从随机正态分布,如此可能会导致样本自选择问题。为此,本文参考顾光等的研究^[39],构建 Heckman 两阶段回归模型来控制样本自选择偏差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具体地,构建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的 Probit 模型(4)用于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MR)。

$$RAC_D_{i,t} = \alpha_0 + \alpha_1 BS_{i,t} + \alpha_2 FIRST_{i,t} + \alpha_3 INDP_{i,t} + \alpha_4 BOARD_{i,t} + \alpha_5 SOE_{i,t} + \alpha_6 AGE_{i,t} + \alpha_7 INST_{i,t} + \alpha_8 AC_{i,t} + \alpha_9 SIZE_{i,t} + \alpha_{10} LEV_{i,t} + \alpha_{11} ROA_{i,t} + \alpha_{12} BTM_{i,t} + \alpha_{13} GDP_{i,t} + \alpha_{14} MAR_{i,t} + YEAR + INDUS + \varepsilon \quad (4)$$

其中, RAC_D 表示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若审计委员会中拥有海归成员则 RAC_D 赋值为1,否则为0。另

表3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盈余管理程度的调节作用

变量	(1) RAC1		(2) RAC2		(3) RAC3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C	0.0121 ***	5.6649	0.0121 ***	5.6827	0.0122 ***	5.7172
RAC	-0.0005	-0.6190	-0.0005	-0.7586	-0.0005	-0.8107
RAC × DA	0.0258 *	1.9041	0.0241 **	2.0987	0.0223 **	2.2565
DA	0.0036 ***	2.9297	0.0027 **	2.1548	0.0024 *	1.8735
Control Variables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7163		7163		7163	
Adj_R ²	0.0867		0.0877		0.0880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双尾),所有 t 值均经过 Robust 调整。

表4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质量的调节作用

变量	(1) RAC1		(2) RAC2		(3) RAC3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C	0.0126 ***	5.7289	0.0127 ***	5.7502	0.0126 ***	5.7433
RAC	0.0013 **	2.3405	0.0011 **	2.4361	0.0010 **	2.5665
RAC × BIG4	-0.0038 ***	-3.2267	-0.0020 *	-1.9383	-0.0017 **	-2.1852
BIG4	0.0008 ***	4.0487	0.0006 **	2.1900	0.0007 ***	3.0514
Control Variables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7163		7163		7163	
Adj_R ²	0.0827		0.0826		0.0826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双尾),所有 t 值均经过 Robust 调整。

外,参考 Dai 等的研究^[40],本文采取英国殖民地 *BS* 作为审计委员会是否拥有海归成员 (*RAC_D*) 的工具变量,若所在省于清朝后期(公元 1644 年至 1911 年)拥有英国特许权或租用领土,则 *BS* 赋值为 1,否则等于 0。英国在清朝后期建立的特许权领地或租界分别是福建厦门市、湖北汉口市、江西九江市、江苏镇江市、广东广州市、山东威海卫、天津、上海。Heckman 第二阶段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都加入控制变量 *IMR*,回归分析显示所有测试变量的回归结果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2. 倾向得分匹配法

理论上商誉减值风险较高的公司会倾向于聘任具有海归背景的人员进入审计委员会以完善内部监督机制,故本文参考周泽将等的研究^[41],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来缓解样本自选择问题。具体地,本文首先构建 Probit 逻辑回归模型(5),估计出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存在的概率。

$$RAC_D_{i,t} = \alpha_0 + \alpha_1 FIRST_{i,t} + \alpha_2 INDP_{i,t} + \alpha_3 BOARD_{i,t} + \alpha_4 SOE_{i,t} + \alpha_5 AGE_{i,t} + \alpha_6 AC_{i,t} + \alpha_7 SIZE_{i,t} + \alpha_8 LEV_{i,t} + \alpha_9 ROA_{i,t} + \alpha_{10} BTM_{i,t} + YEAR + INDUS + \varepsilon \quad (5)$$

通过对协变量平稳性的检验表明,PSM 匹配前,基本所有匹配变量的取值在实验组 (*RAC_D* = 1) 和对照组 (*RAC_D* = 0) 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而在 PSM 匹配后,这些变量的取值在两组间的差异几乎都不存在统计显著,说明 PSM 匹配达到了目标效果。接下来,本文按照 *RAC_D* 的概率进行排序配对,重复模型(1)、模型(2)、模型(3)的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显示,结果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3. 更改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度量方法

为了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审计委员会是否拥有海归成员为标准来重新度量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记为 *RAC_D*,若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中拥有海归成员则 *RAC_D* 赋值为 1,否则为 0,并将之代入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回归分析显示,结果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表明在更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度量方法之后,研究结论进一步得到验证。

4.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会促使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程度提高,但商誉减值风险较高的公司也可能为了完善内部监督机制而倾向于聘任具有海归背景的人员进入审计委员会,因此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鉴于此,本文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处理方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解释变量 *RAC* 滞后一期记为 *RAC_L*,并将之代入模型(1)、模型(2)和模型(3),结果显示各测试项系数的符号方向均未发生变化,仅显著性略有差异,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六、进一步分析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显著提高了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程度,其会引起何种经济后果值得进一步探究。一般而言,伴随着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商誉减值确认进行审计时,需要花费更多的人力和物力^[42],同时商誉价值的评估没有严格的标准,涉及大量的主观判断,提高了商誉减值事项的审计难度,从而需要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对企业商誉减值事项进行审查,降低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43]。因此,在提高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程度时,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从而导致审计费用增加。对此,本文采用中介效应研究方法来进行进一步检验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在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具体地,本文构建如下模型(6)和模型(7):

$$FEE_{i,t} = \alpha_0 + \alpha_1 RAC_{i,t} + \alpha_2 FIRST_{i,t} + \alpha_3 INDP_{i,t} + \alpha_4 BOARD_{i,t} + \alpha_5 SOE_{i,t} + \alpha_6 AGE_{i,t} + \alpha_7 INST_{i,t} + \alpha_8 AC_{i,t} + \alpha_9 SIZE_{i,t} + \alpha_{10} LEV_{i,t} + \alpha_{11} ROA_{i,t} + \alpha_{12} BTM_{i,t} + \alpha_{13} GDP_{i,t} + \alpha_{14} MAR_{i,t} + YEAR + INDUS + \varepsilon \quad (6)$$

$$FEE_{i,t} = \alpha_0 + \alpha_1 RAC_{i,t} + \lambda_1 GWIR_{i,t} + \alpha_2 FIRST_{i,t} + \alpha_3 INDP_{i,t} + \alpha_4 BOARD_{i,t} + \alpha_5 SOE_{i,t} + \alpha_6 AGE_{i,t} + \alpha_7 INST_{i,t} + \alpha_8 AC_{i,t} + \alpha_9 SIZE_{i,t} + \alpha_{10} LEV_{i,t} + \alpha_{11} ROA_{i,t} + \alpha_{12} BTM_{i,t} + \alpha_{13} GDP_{i,t} + \alpha_{14} MAR_{i,t} + YEAR + INDUS + \varepsilon \quad (7)$$

其中,*FEE* 代表审计费用,用企业当年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度量,其余变量定义同前文保持一致。表 5 列示了模型(6)和模型(7)的回归分析结果。第(1)列至第(3)列中 *RAC1*、*RAC2* 和 *RAC3* 项系数都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4)列至第(6)列中控制商誉减值计提程度 *GWIR* 后,*RAC1*、*RAC2* 和 *RAC3* 项系数都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结合表 2 的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会导致审计费用增加,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其原因可能在于,审计委员会的海归成员拥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使其保护股东利益的意愿更加

强烈,倾向于选聘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以提高审计质量、维护股东权益,最终导致审计费用增加,从而更好地履行聘请外部审计机构的职责。这一结论意味着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倾向于支付更多审计费用以聘请高质量外部审计,进而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和维护股东权益,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

七、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近年来,随着海归热潮的不断兴起,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占比不断增加,

海归背景对审计委员会监督效率的影响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本文着眼于审计委员会的海归背景,以2008—2016年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提高商誉减值计提程度。另外,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促进作用在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显著更强,而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则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补充测试表明,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导致审计费用增加,且商誉减值计提在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提高企业审计费用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在控制样本自选择偏差、更改关键变量度量方法以及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等一系列敏感性测试后,以上研究结果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对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关注之不足,丰富了商誉减值计提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有助于厘清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影响商誉减值计提的机理,为企业选聘审计委员会成员提供参考。

依据以上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四点建议:(1)企业在选聘审计委员会成员时,可以适度向具有海归背景的人员倾斜。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提高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专业性和社会责任感,进而增强其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的监督效率,促使管理层及时充分的确认商誉减值损失,避免集中计提商誉减值,降低了企业的商誉减值风险。因此,企业在选聘审计委员会成员时应重视海归人员的引进,适度增加审计委员会中海归人员的占比,从而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监督、审查效率,改善履职情况。(2)关注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对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监督职能发挥的影响。相比较于盈余管理程度较低的企业,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促进作用在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高盈余管理程度的企业应该更加重视具有海归背景的高层次人才对提高企业治理效率的积极作用。(3)重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低质量外部审计的弥补作用。鉴于良好的外部审计质量缓解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促进作用,反之,当外部审计质量较低时,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促进作用显著更强。因此,若企业外部审计质量较低,企业在选聘审计委员会成员时应引进具有海归背景的高层次人才,以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效率,弥补低质量的外部审计。(4)重视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倾向于支付更多审计费用以聘请高质量外部审计的作用。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显著提高了企业商誉减值计提程度,进而倾向于支付更多的审计费用以聘请高质量外部审计来对企业商誉减值计提事项进行全面的审计,因此企业应重视具有海归背景的审计委员会倾向于支付更多审计费用以聘请高质量外部审计的作用。

限于研究主题,本文仅研究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两者之间的关系,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进一步研究:(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不仅会影响商誉减值计提,还可能会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审计沟通、内部控制质量等多方面,未来可以围绕以上主题进行相关研究;(2)除盈余管理程度及审计质量外,可能影响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其他情境因素仍然存在,未来可以进一步挖掘;(3)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之间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如来自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的经历对海归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专业性和社会责任感均存在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分析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的异质性对其治理效率的影响。

表5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审计费用:商誉减值计提的中介作用

变量	模型(6)			模型(7)		
	(1)RAC1	(2)RAC2	(3)RAC3	(4)RAC1	(5)RAC2	(6)RAC3
C	4.3958 *** (26.9822)	4.3672 *** (26.7140)	4.3891 *** (26.9154)	4.3169 *** (26.4504)	4.2865 *** (26.1852)	4.3094 *** (26.3886)
RAC	0.2932 *** (7.4133)	0.1141 *** (3.7847)	0.1617 *** (6.0070)	0.2864 *** (7.2361)	0.1072 *** (3.5655)	0.1557 *** (5.7965)
GWIR				6.4201 *** (7.8735)	6.5108 *** (7.9619)	6.4360 *** (7.8466)
Control Variable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7163	7163	7163	7163	7163	7163
Adj_R ²	0.5930	0.5900	0.5914	0.5958	0.5929	0.5942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双尾),所有t值均经过Robust调整。

参考文献:

- [1] Huang W, Ma G, Chen X. Does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matter in the effect of returnee CEO o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panel threshold analysis [J]. Sustainability, 2019, 11(9): 1-16.
- [2] Liu X, Lu J, Filatotchev I, et al. Returnee entrepreneurs,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innovation in high-tech firm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7): 1183-1197.
- [3] Luo J, Chen D, Chen J. Coming back and giving back: Returnee directors and corporate don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 2016(1): 219-224.
- [4] Zhou Z, Wang H, Cheng X. Audit committee returnees and auditor choice: Evidence from China [J]. Asian Review of Accounting, 2020, forthcoming.
- [5] Bushman R M, Smith A J. Financi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1, 32(13): 237-333.
- [6] Bruynseels L, Cardinaels E. The audit committee: Management watchdog or personal friend of the CEO?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9(1): 113-145.
- [7] Soliman M M, Ragab A A. Audit committee effectiveness, audit quality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Egypt [J].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14, 5(2): 155-166.
- [8] Beatty A, Weber J. Accounting discretion in fair value estimates: An examination of SFAS 142 goodwill impairments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6, 44(2): 257-288.
- [9] Ramanna K, Watts R L. Evidence on the use of unverifiable estimates in required goodwill impairment [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2, 17(4): 749-780.
- [10] 胡凡, 李科. 股价高估与商誉减值风险 [J]. 财经研究, 2019(6): 71-85.
- [11] Bedard J, Chtourou S M, Courteau L. The effect of audit committee expertise, independence, and activity on aggressive earnings management [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and Theory, 2004, 23(2): 13-35.
- [12] 董卉娜, 朱志雄. 审计委员会特征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1): 114-124.
- [13] 王守海, 许薇, 刘志强. 高管权力、审计委员会财务专长与财务重述 [J]. 审计研究, 2019(3): 101-110.
- [14] Bepari M K, Mollik A T.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and accounting and finance backgrounds of audit committee members on firms' compliance with IFRS for goodwill impairment testing [J]. Journal of Applied Accounting Research, 2016, 16(2): 196-220.
- [15] Al Dabbous N, Ghazaleh N A, Al-Hares O. The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and audit committees on goodwill impairment loss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2015, 5(1): 48-62.
- [16] Adams T. Does adding accounting expertise matter? A study of audit committee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 Temple: Temple University, 2016.
- [17] Vlaminc N D, Sarers 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and financial statement quality: Evidence from Belgium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2015, 19(1): 145-166.
- [18] Al-Matari E M, Al-Swidi A K, Hanif F.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Oman: Empirical study [J]. Asian Social Science, 2014, 10(12): 98-113.
- [19] Kaplan R, Roll R. Accounting changes and stock prices [J].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1973, 29(1): 48-53.
- [20] Abdul-Majid J. Audit committee independence and a contracting perspective on goodwill impairment: Singaporean evidence [J]. Verslas: teorija ir praktika, 2017, 18(1): 128-135.
- [21] Aldamen H, Hollindale J, Ziegelmayr J L. Female audit committee member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audit fees [J]. Accounting & Finance, 2018, 58(1): 57-89.
- [22] Oradi J, Izadi J. Audit committee gender diversity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Evidence from restatements [J].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2019, 35(1): 67-92.
- [23] He X, Pittman J A, Rui O M, et al. Do social ties between external auditors and audit committee members affect audit qualit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7, 92(5): 61-87.
- [24] Lapointe-Antunes P, Cormier D, Magnan M. Equity recognition of mandatory accounting changes: The case of transitional goodwill impairment losses [J]. 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Revue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e l'Administration, 2008, 25(1): 37-54.
- [25] Filatotchev I, Liu X, Lu J, et al. Knowledge spillovers through human mobility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Evidence from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 in China [J]. Research Policy, 2011, 40(3): 453-462.
- [26] Zweig D, Chung S F, Vanhonacker W. Rewards of technology: Explaining China's reverse migr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2006, 7(4): 449-471.
- [27] 徐细雄, 朱红艳, 涂未宇, 等. “海归”高管回流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改善——基于文化趋同视角的实证研究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8(5): 99-112.
- [28] 孔宁宁, 吴蕾, 陈绍墨. 并购重组业绩承诺实施风险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以雅百特为例 [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2): 69-79.
- [29] Brown L D, Higgins H N. Managers' forecast guidance of analysts: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05, 24(4): 280-299.
- [30] 王小鲁, 樊纲, 胡李鹏.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 [31] 卢煜, 曲晓辉. 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6(7): 87-99.
- [32] 谭燕, 徐玉琳, 赵旭雯, 等. 高管权力、前任安排与并购商誉减值 [J]. 会计研究, 2020(7): 49-63.
- [33] 张丽达, 冯均科. 不同产权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与绩效变动研究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 106-111.

- [34] Glaum M, Landsman W R, Wyrwa S. Goodwill impairment: The effects of public enforcement and monitoring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8, 93(6): 149 - 180.
- [35] 田新民, 陆亚晨. 中国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12): 114 - 127.
- [36] 张东旭, 曹瑾. 高管变更与商誉减值[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0(3): 25 - 34.
- [37] 姜英兵, 严婷. 制度环境对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研究[J]. *会计研究*, 2012(4): 71 - 80.
- [38] Dechow M P, Sloan R G, Sweeney A P.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J]. *Accounting Review*, 1995, 70(2): 193 - 225.
- [39] 顾光, 陈雨婷, 周泽将. 海外投资、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J]. *会计与经济研究*, 2019(6): 55 - 72.
- [40] Dai Y, Kong D, Liu S. Returnee talent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18, 27(2): 313 - 337.
- [41] 周泽将, 罗进辉, 李雪. 民营企业身份认同与风险承担水平[J]. *管理世界*, 2019(11): 193 - 208.
- [42] 叶建芳, 何开刚, 杨庆, 等. 不可核实的商誉减值测试估计与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16(1): 76 - 84.
- [43] 王清. 已审报表被重述影响审计质量吗? ——基于签字注册会计师个体层面的研究[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3): 51 - 61.

[责任编辑:刘 茜]

Returnee Audit Committee and Goodwill Impairment Provision

WANG Haoran¹, WANG Biaohua², ZHOU Zejiang³

(1. Economics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2. Secretariat, China Audit Society, Beijing 100086, China; 3. Business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returnees in audit committee, and its impact on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audit committee deserves attention. Based on this, taking goodwill impairment provision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using listed companies with goodwill events in Chinese capital market from 2008 to 2016 as samples,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of audit committee by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urnee background of audit committee and goodwill impairment provi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eturnee audit committe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degree of goodwill impairment; (2) When the degre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is high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returnee audit committee on degree of goodwill impair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3) Audit quality hinders the promotion of returnee audit committee to degree of impairment of goodwill; (4) Returnee audit committee increasing audit fees, and goodwill impairment provision plays a mediation role in the above process.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returne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and helps us to understand how returnees audit committee exerts an impact on goodwill impairment provision.

Key Words: audit committee; returnee background; goodwill impairment provision; earnings management; audit quality; audit fees; corporate governance